

现代语文教育论著选读

黎锦熙

# 语文教育论著选

黎泽渝 马啸风 李乐毅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黎 锦 熙

# 语文教育论著选

黎泽渝 马啸风 李乐毅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3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黎泽渝等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现代语文教育论著选)

ISBN 7-107-11297-X

I. 黎… II. 黎… III. 汉语-语言教学-研究-文集 IV. H1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622 号

---

现代语文教育论著选读

**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

黎泽渝 马啸风 李乐毅 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华云电子数据中心照排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75 插页 5 字数 663,000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980

平装本 ISBN 7-107-11297-X/G·4464 定价:24.40 元

精装本 ISBN 7-107-11298-8/G·4465 定价:29.30 元

# 前 言

黎泽渝 马啸风 李乐毅

黎锦熙先生(1890—1978),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是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巨子之一,蜚声中外的语言文字学家,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 进步学者光辉的一生

黎先生幼年在家乡读书,在传统文化方面打下了广博而坚实的基础。15岁考取清末最后一届秀才。随即在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考入北京铁路专修科,又转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后,先后任湖南编译局编译员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1915年应聘到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1920年起一直担任北京高师(后多次更名,即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国文系教授,并兼任过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的国文系教授。同时,长期担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还兼任过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临时所长。抗日战争时期,随北师大西迁西安,辗转至汉中和兰州,先后担任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北平师大复校,继任国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长,又借聘于湖南大学。解放后,一直是北师大教授,研究生导师,曾

任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校长）等职，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还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黎先生是本世纪初较早接受和传播民主进步思想的杰出知识分子之一。16岁那一年，凭着弱龄青年的勇气，在长沙发起组织“德育会”，以“牺牲个人，努力救国”为号召，不久遭官厅打击，逃匿还乡。辛亥革命前后，曾主笔《长沙日报》，总编《湖南日报》，鼓吹各省反清独立，实行民治，都受到当局查办。后与杨怀中（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同仁组织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附办《公言》期刊，又组织哲学小组，湖南一师的学生毛泽东、陈昌、蔡和森等常到社研讨，由此加深了与毛泽东的友谊。他秘密保存1915—1920年毛泽东给他的六封亲笔书信和毛泽东主编的刊物等珍贵的革命文献，解放后献给了中央档案馆。1916年参与发起国语研究会，推进国语运动，这个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25年任北京女师大国文系代主任时，与鲁迅站在一起，发表声明，揭露校长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同年，公开上书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小学复古“读经”。次年参与发动东南三省焚烧小学文言教科书的运动，与封建文化作坚决的斗争，其声势震动一时。“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后，黎先生作诗抨击讽刺政府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后结集为《国难集》、《流浪集》。1938年，在城固西北师院收到毛泽东从延安寄赠的《论持久战》，当即约集同仁阅读研讨。1946年，在重庆，黎先生与许德珩、潘菽、李公朴等人发起组织“九三学社”，团结了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1948年黎先生在北平积极支持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大陆时，企图劫走部分知名教授，给黎先生送来了飞往台湾的机票，他严正地予以拒绝，并满怀激情地迎接解放军进京入城。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黎先生平生第一次参

加了国家的政权工作，先后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主席团，第一、第二、第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同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常务理事，一直受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朋友。

黎先生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和语文教学近 70 年，涉及的领域有语法学、修辞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辞书学、教育学、方志学、史学、文学、哲学、佛学、文字改革以及少数民族语文等，广博精深，著述等身，共撰有 700 余种论著，其中论文 500 余篇，专著百余种。黎先生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坚忍不拔，奋斗不息。89 岁高龄时，仍致函中央，建议在繁荣自然科学的同时，尽快发展社会科学。临终前几小时，在病床上输液时，仍逐字逐句审订由泽渝记录整理的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语文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先驱

八十年前，黎先生已经成为国语运动的中坚。国语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在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又反过来促进了白话文运动。它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有相应的科学研究成果作后盾，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间，黎先生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与同仁早在 1916 年倡建了国语研究会，推蔡元培为会长，黎先生从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解释国语研究会的两个宗旨：一是“国语统一”，“就是要整理改良中国特有的语言，使它统一而易于普及”，而“国语的范围，是包括这‘国音’、‘词类’、‘语法’三大部，是缺一不可的”，①二

---

① 《何谓国语教育》

是“言文一致”，即书面语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使口头语和书面语一致起来。此外，他还提出自己和一些同仁的理想：“国语运动最高的企图、最终的目的，乃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字”。<sup>①</sup>从事宣传的同时，他脚踏实地开展具体工作，如调查各地方言，开办国语讲习所，审查白话教材，出版有关书刊等。黎先生会同国语研究会成员取得的成果和科学研究实绩，是相当丰硕的。

**在推广国语和改革汉字方面：**黎先生等人促成了北洋政府于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他又创制了带有注音字母注音的各种型号的汉字铜模，以排印书刊；1922年与钱玄同等联名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1923年提出“词类连书”的原则，要求以词而不是以字为单位来拼写现代汉语；同年起与钱玄同、赵元任等致力“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研制，1928年该方案由教育部作为注音字母的第二式予以公布，成为第一个得到政府承认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1941年提出了《边疆教科书及通俗读物，概用注音符号互注读音，以利推行而便得传习案》；1944年倡导创办了为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训练人才的国语专修科，其后100多名“黎门弟子”赴台推广国语，台湾省借助“注音汉字”用了10多年时间就普及了国语。

**在提倡白话文方面：**1915年即力主把小学“国文科”（沿用清末“中国文学科”之称）改为“国语科”，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训令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次年又确定初等小学四年间教材纯用语体文；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期，“复古家”们掀起恢复“读经”的逆流，黎先生挺身而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五四”白话文学兴起之际，黎先生撰文表示支持，认为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也就是“国语文学”。

---

① 《钱玄同先生传》

**在语法研究方面：**“五四”以后白话文取得了胜利，但被国粹派攻击为有“文”无“法”。黎先生则搜集大量白话文的“活语言”材料，进行创造性的归纳和研究，力求揭示出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1920年他首次开出“国语文法”课，1924年又出版了划时代的《新著国语文法》，有力地回击了国粹派，捍卫了新文化，该书以后修订了四次，在国内已印行达25版之多，不愧为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之作，影响至深。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郭绍虞所评赞的，“文法之学，肇自《文通》（指研究古汉语语法的《马氏文通》）；语法之学，建于黎翁”。1933年，黎先生又出版了《比较文法》一书。

**在辞书编纂方面：**为了规范语音、语词，1917年即倡议编订《国语辞典》；1923年促成“国语辞典编纂处”的建立，1928年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黎先生主持工作前后达30年之久；三十年代初期开始着手编写，后来印出了《中国大辞典样本稿》，出版了《国音常用字汇》、《国语辞典》、《中华新韵》等十多种辞书，上述三种被当时政府颁定为全国读音标准、诗词用韵标准的“官书”。此外搜集整理了卡片300余万张，积累了编纂辞书的宝贵经验。黎先生认为：“要对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4000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惟在‘大’辞典！”<sup>①</sup>

至于黎先生在语文教育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也是人所公认的。

在解放前的三十多年里，黎先生致力于语文改革和建设工作的，他的思想言行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倡的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方向。他对语言文字所作的研究非常深入，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结论大都比较系统、细致、全

---

① 《国语运动史纲》



面,并能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他前期的学术研究,正值西学东渐,因此他在构筑自己的理论框架时,迅捷而有选择地吸收了不少西方语言学先进的科学的成果,而同时他又十分注重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实际和传统的实践经验,因而他所创建的理论带有本民族的鲜明特色。再者,他的语言科学和语文教育是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不仅嘉惠青少年学生,而且为各阶层人民首先是工农劳苦民众送去了精神财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敦促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接近民众,指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而黎先生的一生恰恰是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符合毛泽东的这一教导。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黎先生坚持不懈地战斗在语文战线的前列,其思想基础在于强烈的爱国主义。他明明知道自己从事的文教工作特别是普及性工作艰难困苦又不易见效,正如1945年在兰州写给友人信中所述那样:“扫盲工作,历年办理,大都虚应故事,并无实效可言”,其“政治的原因”是“政府方面并无诚意,真正扫盲启智,实于官僚政治无利益,故提倡不出自内心,推行徒具其形式”;<sup>①</sup>然而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扎扎实实地去做,义无反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背后,全靠振兴中华的信念在支撑。他深知,只有统一语言,改革文字,才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促进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实现国家富强,促进民主革新。

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我国的语文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开拓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制订了有关的政策,如推广普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

---

① 《论师范教育之中心工作》

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制订、推行并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方案等,其任务和要求显然是对国语运动的继承和发展。黎先生一如既往,再接再厉,在语文改革和建设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如参与组建文字改革协会,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方案》公布前与吴玉章合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一文,影响深远;探讨检字法,多有发明创新;晚年还研究汉语“双拼”方案,对电子计算机的汉字拼音输入法有启发意义;继续编纂出版了一批辞书字典,并倡议编纂大百科全书;在《新著国语文法》的基础上,予以“提高化、理论化、科学化”,又编写出版了150万字的《汉语语法教材》(与刘世儒合著);另外出版了《中国文字与语言》、《文字改革论丛》、《字母与注音》、《汉语规范化论丛》等著作,为汉语规范化殚精竭虑,勋劳卓著。他革故鼎新,绝不保守,奋力开拓,永不停滞。黎先生的光辉业绩,在中国语文建设的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 为创建语文教育学开辟先路

黎先生也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学的开创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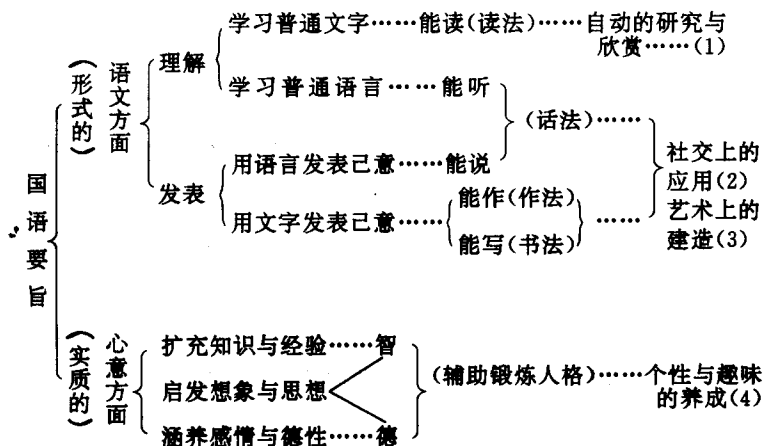
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和语文研究历史悠久,积聚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到封建社会后期,日益显现出严重的弊端。其一,它没有独立的地位,是经学和理学的附庸,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内容和方法上充斥着大量封建糟粕和陈腐落后的东西。其二,在语言现象与语言理论、文字与语言、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古代语言与当代语言等诸多关系上,重视前者,忽视乃至排斥后者,未能发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体系。1903年,清政府规定“中国文学”(简称“国文”)单独设科,从此有了语文学科。与此同时,随着西方近代学校的兴起,学科教育学应运而生,随之传入了中国。“五四”运动前后,

不少教育家已讨论师范院校如何进行学科教授法的教学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各科教学法的研究对象极大地拓宽和延伸了，今天已经发展成为较完善的学科教育学。当年，黎先生从“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白话文进入小学教材的现实出发，总结了自己丰富的语文教学实践经验，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教学法》一书，这是现代史上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文教学法的专著，1950年，又将三、四十年代的教法著作结集为《新国文教学法》出版，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黎先生在语文教育方面的贡献可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提出了关于语文教育的性质、目的、任务等一系列新的观点。

黎先生在《新著国语教学法》中说：“语言的用处，一是表情达意，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文字和语言，都是代表事物和思想的符号：文字这种符号，是用手写、用眼看的；语言这种符号，是用口说、用耳听的：不过我们运用的官能有不同罢了。”接着，他列表阐述了语文教学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上表归纳出了语文教学的四大目的,其中以自动的研究与欣赏、社交上的应用、艺术上的建造等三项为主,这就明确了语文教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工具性;但由于语文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又应注意通过它养成个性与趣味,以求在锻炼人格上起到辅助作用。黎先生认为,二者的地位不宜颠倒,却又不能有所偏废,既要重在培养语文能力,也不忽视陶冶情操和提高智力。至于语文教学的具体要求有五项,即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从而第一次把听、说两项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黎先生主张通过读法、话法、作法、书法,加强基本训练。

上述简明、严密又富于辩证精神的概括,比较科学地揭示了语文教育学科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回顾我国语文教学所走过的曲折路程,对黎先生70年前达到的认识水平,不能不感到钦敬。

## 二、深入实践,为各级各类语文教育设计了教学方案或课程纲要

教学方案集中地落实了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黎先生起草的这类文件,不仅凝聚了他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所付出的心血,而且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和教育家的广阔视野与深谋远虑。例如,他拟定的一些中小学语文教学方案,贯穿着革新精神,又合乎国情,很重效益。又如,当时不论哪种门类的大学,第一学年都开设“大学国文”课,而效果多不理想,他则坚持维护这一举措,作了改进教学、提高质量的周密规划,其基本思路对今天的“大学语文”课仍有借鉴意义。他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系,设置共同必修的科目”,打好文、史、哲的共同基础,拓宽知识面。而且要求中文系科学生必须修习目录学,以掌握检索、利用资料的能力,为日后自学进修准备条件。在《师大改进的工作重点——课程》一文里,对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关于师范院校是否单独建制,“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高度概括,指出,为了满足国家对师资的需求,师大必须重点改进课

程,从编制、师资、教材、教法上入手。《中国近代语研究法》是“近代语”课的教学计划,指出研究的目的是把从古代语到现代语的过渡时期的真相考察明白,从而了解现今标准国语的基础,知道现今方言分布的原因;方法则是:先汇集,次整理,又次比较归纳,于是达到穷源(隋唐以前)竟流(国语和方言)。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黎先生作了高屋建瓴的剖析,这是研究性课程指导的一个范例。

### 三、大力从事语文教材的建设和改革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黎先生认为教材优劣关乎教育成败:“所谓根本问题者奈何?曰:我国教育久无效果,原因虽多,而总原因实为教材之不适宜。……而其中又以国文一科为最,尤以初等小学所授之国文为最。……上之既无优美之趣,不足树文学之根柢,下之又违应用之旨,无教于国民之聋盲。”<sup>①</sup>这是指斥旧国文教材内容陈旧,远离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小学生用文言教材也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从教育原理、社会生活上看来,义务教育的国民学校,用这种古体的文言,实在毫无道理。”“从前女子用布来缠足,我们可怜她伤害了天然的体肤,不得不设法解放她;现在儿童用文言来‘缠脑’,我们可怜他伤害了天然的性灵,所以也要设法解救他。”<sup>②</sup>由此可见改革教材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黎先生的教育生涯是伴随着编审教材开始的。1914年他与友人一起开办编译社并编写了中小学国文教材。人们可以从中发现,黎先生是怎样匠心独运地通过语文教科书来陶冶学生的灵魂,向他们输入有关知识,并发展其智力的。1915年黎先生被特约到教育部编审教材后,仅中学国文教材就参与审查了一百多套,《三十

---

① 《论教育之根本问题》

② 《国语教育上应当解决的问题》

年来中学国文选本书目提要》一书，记录了这些实绩。黎先生主张，国语教材在“小学以‘儿童文学’为主”；“进至初中，则教材以选读古今名著为主，而辅以实用文”；“高中教材亦以名著为主，唯程度较进，分量较增，更宜支配以文学史的系统，使知古今各体文学之相当位置。此外则本国文字、音韵、文法及国故之类，亦当使知其大凡焉”；“专科及大学，……亦于一二年级设立共同必修之普通国文，……而各大学或别选语体文艺为补充教材焉”。<sup>①</sup>他对教材编写还有不少真知灼见，如为适应各地发展不平衡，可以设正副两种读本，各层次学校间的教材要统筹衔接等，但相比之下，黎先生做的实际工作则更多，所编教材从平民识字到大学课程无所不有，数量难以计数。

#### 四、通过实验，全面改革语文教学法

传统的语文教学有合理的东西，而弊端也很突出，如灌输式，教学组织单一化，考查成绩时鼓励死记硬背等。黎先生在推出新教材的同时，潜心探索教法，总结出很多成功的办法。在《新著国语教学法》和《新国文教学法》中，黎先生把语文教学的基本训练归并为四种，每种又有各自的合理程序。

关于“话法”（说话）。目的在于训练儿童“学习普通语言”，达到“能听”，并且“用语言发表己意”即“能说”。<sup>②</sup>黎先生指出：“说话教学，以前殊不重视。”“在学习之正当过程上，不复能徒恃眼看、手写，必须兼作口说、耳听之训练，故说话一项，实已为本国语文教学之中心。”他认为说话教学“必先有一种客观的标准语”，但也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律”，并别开生面地提出：“说话教材如用文字记载，

---

① 《本国语文教学法提要》

② 《新著国语教学法》

用汉字不如用注音符号拼写”，也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来拼写。<sup>①</sup>

关于“读法”。目的在于使儿童“学习普通文字”，做到“能读”；并与说话结合起来，达到“理解”，从而实现“自动的研究与欣赏”。<sup>②</sup>当时在阅读教学上，有偏重语言文字的训练（“形式主义”）和偏重内容实质探究（“实质主义”）的两派，各有偏失。黎先生则认为要根据教材性质和学生程度而灵活处理，具体对待，提出“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即在教师指导下，使学生由理解（经过预习、整理）到练习（进行比较、应用）再到发展（进而创作、活用）。<sup>③</sup>四十年代中期，又发展为预习、整理、总结深究或练习、发展与应用四个教段，<sup>④</sup>力求更符合阅读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内在要求。

由于初中以上国文课程有文言、白话两种文体，教法上的混同常导致教学失败，黎先生提出必须严格区别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两种教法。要点是：“白话文须与语言训练相联系”，先要“耳治”，即用耳听而不急于目视，注重“朗读”，有“疏解”、“论理”、“审美”的种种朗读法；“文言文须与外国语同比例”，必须熟读成诵，直至“背诵”下来，将注释对照本文，反复揣摩，实行彻底的“翻译”。<sup>⑤</sup>

关于“作法”（“缀法”，作文，写作）。目的在于“用文字表达己意”，既是“社交上的应用”，又是“艺术上的建造”。<sup>⑥</sup>作文要循序渐近。初小前二年“以简单语言之记录发表为主”；初小后二年可练习“实用文、记叙文、说明文诸体”；高小“则可进而间作抒情、议论之文”；中学以上“其应习之文体，大致亦不外此数种；至于诗词等纯文艺作品，及古体的美文，可随个性，自由拟作，不加限制，亦非必

---

① 《本国语文教学法提要》

②③ 《新著国语教学法》

④ 《新国文教学法》

⑤ 《新国文教学法》

⑥ 《新著国语教学法》

修”。对作文总的要求是“以事理真切、下笔迅速、文法正确为三大要素”。<sup>①</sup>

黎先生把作文训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先求“通”，再求“美”。他十分重视“改错”的环节，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行订正，填写字体、文法、事实、思想四种“错误表”。<sup>②</sup>黎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初就说过：“作文簿的批评、订正，是最耗教师的精神和光阴的苦事，而于儿童又实在无甚益处，因为他们只注意等第、分数，或圈点、评语；……而且每级学生数十人，每周卷子数十本，事实上哪能批改得精细，恐怕有时还要‘师不必贤于弟子’呢！”<sup>③</sup>因此，他倡导采取由学生自己改错并记录的方法，这样做完全符合启发式的教学原则，解决了困扰作文教学的一大痼疾。

关于“书法”（写字，习字）。黎先生建议幼稚生及初小低年级，可利用玩具，“先熟练四十个注音符号之间架，进而练习注音符号楷体之笔法”，也就熟悉了汉字的各种基本笔式和简单的结构；到学生年级渐高，则临摹汉字的“中楷与小楷”，“参习行书及简体字，以迅速使用为第一目标”（这里提倡简体字，也富于果敢精神）；“至高小及中学以上，可以临帖，篆隶行草，随性所宜”，不过这已属于艺术，无关于书法的应用了。<sup>④</sup>

黎先生的教学法专著为我国语文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取得成绩的原因，首先在于他极为重视实践，从中国的语文教育状况出发，他几十年来亲自在教学活动中进行实验，即使担任学校领导，也坚持讲课，即使早为大学名教授，也兼任中学课程，并利用假期参加小学教学或成人扫盲工作，在教学实践

---

① 《本国语文教学法提要》

② 《新国文教学法》

③ 《新著国语教学法》

④ 《本国语文教学法提要》



中,不断地总结、改进、提高,当然他也吸纳了同时代语文教学改革的新成果。再者,他注重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取其精华,加以熔铸,如既注重读写,也注重听说,既提倡诵读,却不因循守旧,盲目照搬旧法。另一个方面则是广泛借鉴了外国教育家的科学理论和外国学校的经验。黎先生研究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教育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的成果,吸收消化,力争以当时较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解释和研究我国的语文教学实践,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避免生吞活剥。以上种种因素,使黎先生的教学法研究不仅在二十至四十年代处于该学科的前列地位,直到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他提出的“写作重于讲读”,“改错先于求美”,“日札优于作文”的“三原则”等,<sup>①</sup>的确富于生命力,能够启发引导人们在探求语言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去掌握语文这一工具。

### 五、在语法教学、拼音教学等领域不断探索,卓有建树

1920年黎先生首次在我国开设并亲自讲授国语法课。在近半个世纪期间,他一直战斗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第一线,桃李满天下。他撰写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语法论著,其中大部分属于语法教材或语法教学参考书,丰富了我国语法教材的宝库,形成了黎派语法体系,对我国传统语法各家影响深远。他积几十年教学和研究语法的经验,从理论上总结出:语法教学体系和科学体系在内容和形式上虽有种种不同,但是它们的关系是“迭相改善”的,这两体系都要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相互促进。科学研究的发明创造要能够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教学体系则是要把自己研究而认为较好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实践,它同样也是要有发明和创造的。好的教学体系是要建立在先进的科学体系之上的,并根据教学需要进行“加工”,所以两体系是相互促进,同进并举,“迭相改善”的。

(一)创立了具有民族性的“句本位”教学法 他认识到汉语